



记得那些甜蜜的事

〔美〕艾伦·格林 著 闫雪莲 译

Remember the Sweet Things

记得那些甜蜜的事

PDG

南海出版公司

Remember the Sweet Things

〔美〕艾伦·格林 著 闫雪莲 译

记得那些甜蜜的事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得那些甜蜜的事/[美] 格林著; 闫雪莲译.

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1.11

ISBN 978-7-5442-5610-0

I. ①记… II. ①格…②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 第18892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037

REMEMBER THE SWEET THINGS © 2009 by Ellen Greene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Ellen Greene c/o The Stuart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记得那些甜蜜的事

[美] 艾伦·格林 著

闫雪莲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
特邀编辑 第五婷婷

装帧设计 王晶华

内文制作 唐人佳悦

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7.25

字数 148千

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610-0

定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引 子

我有一份长长的清单，二十一年来它的内容不断增加，记录着我的伴侣马绍说过做过的一些贴心有趣的小事。并非是什么特别滑稽或神圣的事，只是关于一个好男人，一位好丈夫的点点滴滴。比如某个周五晚上，他熬夜到很晚，只为给我做个橱柜架。他当时已经很累了，况且他向来不喜欢做细致的木匠活，因此我决定把这件事记录下来。他如果一边干活儿，一边吹口哨，便会得到加倍表扬，态度可嘉嘛。

我总会悄悄地草草记下只言片语，通常都是在事情刚刚发生之后。有时候，我的包里塞满了一把把小纸片，因为还没来得及把上面的内容誊写到单子上。一年下来，能够记满六七张卡片纸，因为我的字写得很小，所以总共会有一百多件贴心的小事。情人节那天，我会把它们复印好，夹进一张卡片里，送给马绍。

他的反应始终不变：打开卡片，找到里面的几页纸，会心一

笑，然后数一数条目。“再一次证明，我拥有一位了不起的好妻子。”他总会这么说。然后，他面带笑容，舒舒服服地坐在他那把绿色椅子上，认真读起来。

我待在另一间屋子里，假装忙这忙那。几分钟后就会听到抽鼻子的声音，我知道他在哭。他读完后会走到我身边来，轻轻地抱住我晃来晃去，给我一个长长的、认真的吻，然后说：“谢谢你，艾尔。”只此而已。然而对于我，这是最完美的反应。因为感激他而被感激——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？

这一次，我轻易地获得了生命中最重要东西。曾经的离婚给了我太多教训，我再也不愿承受婚姻破裂带来的痛苦。而我的两个孩子，十六岁的詹妮弗和十四岁的迈克尔，也应当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那段婚姻在尖酸刻薄的争吵中结束后，孩子们的父亲离开美国并再婚，从此一去不返，这一切伤透了他们的心。孩子们却一如既往地理解我、体谅我，满怀爱意地接受了他们的继父马绍。这个男人真心实意地爱着我和我的孩子，我暗暗对自己说，如果再搞砸了，我就是个大傻瓜，是个失败而可怜的母亲。

刚开始和马绍交往的时候，我便有了提笔记录的想法。不过，当时我想的可不是要记住所有的甜蜜时刻。和以前的伴侣相处时，我最擅长的莫过于此。跟那些不好好待我的男人待得太久，我总是选择记住他们偶尔流露的柔情蜜意，而轻易忘记他们惯常表现的漠不关心，尤其是在对待孩子的时候。

这种选择性记忆最终伤害了我，也伤害了孩子。我不能让它再次掌控我们的生活。当时我疯狂地爱上了马绍尔·惠特尼·格林，对他没有丝毫的客观了解，但我还是决定，强迫自己记下他

对我们的伤害，不考虑任何借口和理由。

可惜马绍从未给过我这样的素材。约会四个月后，我的单子仍然空空如也。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，他的体贴、机智和风度始终如一。他和两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融洽，几乎没什么矛盾，我不禁忧心忡忡：难道他们三人只是在演戏，从没想过将这种关系继续下去？可是他们看上去真的喜欢彼此，不用我提醒，马绍总会腾出时间与他们相处。比如某个周六，他邀请他们一起去滑雪；再比如某个晚上，我有事外出，他带着他们去饭店共进晚餐。他对迈克尔说：“能帮你完成数学作业，我很高兴。”对詹妮弗说：“很期待去看你的乐队演出。”我们相信他。

所以我改变了策略。也许我的魅力和爱意击中了马绍，也许他真是我的梦中情人。假若如此，为什么要先入为主地关注消极方面？为什么不把记录的目的扭转过来，记下那些美好的瞬间？这次我决定不再依赖选择性记忆，而要充分发掘证明我们爱情持久长远的点点滴滴。当然，不愉快的事也无法避免，但我可以将好好坏坏都写下来，比较一下孰多孰少，这样也有助于我记录到底。

被我称为“记得那些甜蜜的事”的清单就这样诞生了。现在想想很可笑，我曾经以为只有不断重温过去，才能忍受和马绍的现在。而实际上，他每年都会给我新的素材，很少有重复的事情，尽管他那些熟悉的条目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微笑。自然而然地，我将“甜蜜的事”作了延伸，把我们一起度过的难忘经历都收录在内。于是，一百一十页的分享、友爱、幽默和温情构成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。

1 初识

1983, 1984

我知道最好别搭理《想你所想》上登的那些不靠谱的广告。如果雇主不告诉你他的身份，那很可能是在隐瞒什么，我们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经常会给别人这样的忠告。但我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得照着广告投递简历。

从科罗拉多搬到马萨诸塞后，我度过了灾难性的六个月。我是一名职业技能培训师，但在这里根本找不到此类工作，劳动力市场紧绷。我的两个孩子又都不喜欢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新学校。我和乔相恋是我们来到东海岸的最初原因，然而这段关系几乎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开始解体。所以当来自威斯特马斯的“莫绍·格林”给我打电话时，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面试的邀请。这是一份培训经理的工作，雇方是詹姆斯伯瑞公司，一家很小的阀门制造公司，离我住的地方有一小时的路程。我不清楚阀门到底是什

么玩意，但这又有什么要紧？我暗自思忖。他们寻求的是管理发展，而我曾为通用和美孚这样的大公司组织和教授过管理技能课程。我不知道威斯特在哪儿，根据莫绍的描述和地图的指示，我推测应该是在伍斯特市。我想象这位莫绍一定是个身材矮小的秃顶犹太人。

面试那天路况极其糟糕，从斯普林菲尔德到伍斯特的公路上结着冰，能见度很低。我驾车在暴风雪中行驶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，因为迟到，整个人都变得紧张兮兮的。电话里的那个“莫绍”原来叫“马绍”，是马绍尔的简称。当时他看上去也有点神经质。

“我们必须快点，二十分钟后我要向执行委员会作个报告。”他急促地说。我注意到他的左腿有节奏地抖着。

接下来的五分钟，马绍要么不停地看表，要么就盯着眼前的一堆邮件，问着一些老套的问题，比如“请介绍下你自己”、“你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是什么”之类的。他完全心不在焉，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一直盯着他看。如果眼睛更蓝一点，发型更帅一些，他就可以冒充大明星保罗·纽曼了，就连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都很像。更棒的是，他的个子比保罗·纽曼还要高些，六英尺吧我猜。五十出头的岁数，新英格兰上流人士的口音，很有魅力，不是吗？我几乎陶醉其中了。

问题是，把自己推销给不太注意你的人实在太难了。十分钟后，我把他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。

“我真的认为我非常适合这份工作，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告诉您原因的最佳时机。”我字斟句酌地说道，这些词都是从我以前教过的面试技巧课程里拽出来的。“我们不如再找一个对您来

说更合适的时间，您觉得呢？”

马绍低头看着自己的鞋，呵呵笑了，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。他说很抱歉让我这么辛苦地奔波两次，问我第二天下午是否合适，并且建议最好选一个离两人都不太远的地方见面。

“以防天公不作美。”他说。

我没有什么先见之明。如果当时就能预见到自己日后会成为艾伦·格林，那么就在那个时候、那个地点，我的甜蜜清单早已开始了。

他提议在马萨诸塞州斯特布里奇镇的“公众之家”见面，因为当晚他要与人在那里会餐。这家小酒店位于古老的波士顿邮路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。酒店外观十分漂亮，古典的白色盐盒式建筑，点缀着黑色的百叶窗。我提前半小时到达，既是为了稳妥，也是为了能有时间参观一番。置身此地，仿若进入了美国早期历史，让人不由地肃然起敬。

在酒店的餐厅见过面后，我们在一张宽大的厚木桌旁相对而坐。石材壁炉里燃着微弱的火焰，马绍正好背对它，壁炉架宛如相框般将他围住。吃完晚点的午餐，马绍向我详细介绍了詹姆斯伯瑞公司和他们的工业用阀门生产线。“哦，天哪，这世上还有比阀门更无聊的产品吗？”我暗想。沉闷的话题和温暖的炉火让我有点昏昏欲睡了。

接下来，他开始更详细地介绍我申请的职位。我将和他一起工作，制订让公司的一千二百名员工提高业绩的方案。我还需要培训所有经理和主管，教他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上司。“不错呀，”我想，“我这个自称无所不知的新人要对所有人指手画脚了。”

我问起马绍自己的情况。他先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个生产管理方面的职务，接着告诉我他曾在西班牙建过工厂，后来在一家小型信封公司工作，来到詹姆斯伯瑞已经有四个年头了。

“您是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吗？”我问。仿佛美国再没有谁能把“rs”连在一起时的音发出来。

“是的，我的先辈是在一六三六年从英格兰来到这儿的，”他说，“但我们家这一支的血统里没有太多冒险精神。三百多年间，我们仅向内陆移了五十英里，到达现在的伍斯特。”

我认识的第一位新英格兰佬，像背台词一样娓娓说道，我想这样的问题他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。

不过，我考虑更多的还是这份工作，一家小型制造公司是个不错的休息地。前两次不明智的职业选择已让我筋疲力竭，一个是传媒帝国，一个是石油巨头。过去五年里，我和孩子们搬过三次家，在三个不同的州生活过。如今，在麻烦不断的人际关系中纠缠太久之后，我决定终止这一切，就像十年前结束和卡洛斯的婚姻那样。

一九六八年，我和卡洛斯相识于哥斯达黎加。对我而言，独自前往哥斯达黎加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。我出身于工人家庭，在威斯康辛州的丰迪拉克市长大，那是一个被小型家族牛奶场包围、仅有三万五千人的城市。待在家里的十八年中，我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经历，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辆大篷车上，骄傲地前往纽约，参加我大哥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。我的求学生涯中有十二年在只收白人的天主教学校度过，之后费了好大劲才得到牧师赖尔登阁下的特许状，去麦迪逊州立大学就读。美国中西部的

天主教徒认为，这所大学是所谓的“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老巢”，家长和牧师都害怕我们在那里丧失“信仰”。

在麦迪逊，我是一个差劲的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，经常不敢在课堂上张口。当我终于说出点什么的时候，听上去就像一个羞怯的游客背诵旅行指南里的句子。为此，我制定过一项自我提高计划：在西班牙语国家找份工作，待上一个夏天。我能买得起最南到巴拿马的机票。虽然妈妈不赞成这个计划，但我可以自力更生，靠自己赚的钱读完大学，因而觉得有权利不听她的话。

说实话，如果我女儿像我当初那样盲目地去外国找工作，我也不会同意。我把头发染成金黄色，拍了新照片，洗了好多张，分别塞入亮蓝色信纸里。信是手写的，信纸上还喷了些“十面埋伏”香水。在华盛顿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一本书上，我找到了美国各公司在中美洲分公司的地址，于是把一百封香气四溢的信寄了出去，每封信都寄托着我对工作的无限渴求，什么工作都可以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信件发出的几个月中，我陆续收到了六份答复。听上去最有前途的是曼哈顿衬衫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。这家公司的 CEO 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，据他说，我的信让他回想起“那些尽情玩乐的日子”。他不仅给了我一份用西班牙语处理事务的办公室工作，还安排我住在他秘书的姑妈家里。

他果然是个尽情玩乐的家伙，他的秘书原来是他的情人。有一次我单独跟他待在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挺着啤酒肚，翘着墨西哥英雄潘乔·维拉式的胡子，绕着他的办公桌追逐我，那情景就像一出拙劣的滑稽剧中的一幕。但卡洛斯那时已出现在这出剧中，他把我从那里拯救了出来。

一个月前的某个周日下午，我和卡洛斯在哥斯达黎加乡村俱乐部的每周舞会上相识。这种舞会其实是改头换面的“性市场”，却声称是安全的社交场合，为给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舞台，让他们能盛装打扮，互相认识和了解。像卡洛斯这样雄心勃勃的上进青年也混迹其中，而年轻的外国人，尤其是年轻的外国女性，总会吸引人们热切的目光。我来到这里的第二个星期，房东的侄女邀请我参加周日舞会，我欣然前往。进门不过几分钟，一位高个儿拉美帅哥就向我走来，他有一双传说中深邃的黑眼睛，他称自己为“El Pana”（巴拿马人卡洛斯），邀我与他共舞。他的舞跳得极好，我很难跟上他的舞步，因而有些慌乱。可他并不在意，只是开心地笑着，坚持教我跳昆比亚和伦巴，整个晚上我都在跟他跳，次月的舞会依然如此，他几乎独占了我身边的位置。我的心被喜悦填满。

卡洛斯帮我找了一份更为有趣的工作，我成了哥斯达黎加国有电话公司的一名海外接线员。晚上下班后，他带我去跳舞或看电影。我们俩骑着突突作响的黄蜂牌摩托车，绕着小城转啊转，偶尔停下来在路边的露天小饭馆吃烧烤，还有刚出锅的软玉米饼。或者一起去简陋的酒吧见他的朋友，喝点便宜的朗姆酒和可乐，吃点油炸大蕉和酸橘汁腌鱼，这些都是酒吧为招揽客人而提供的免费小食。作为一个有着修长美腿的外国女人，我总能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。我们俩都很享受这种被人瞩目的感觉。

交往两个月后，卡洛斯开始在深夜跑到我公寓的窗户下，手捧鲜花，带着两名吉他手，唱歌赞美我漂亮的绿眼睛。在威斯康

辛州很少能看到这样浪漫的场景。我拨通了父母的电话。

“我恋爱了，九月份不回家了，我要转到哥斯达黎加大学来。”我向他们宣布，确保自己正确地发出了 Rica^①里那个卷舌音“r”。后来我母亲告诉我，她当时以为我怀孕了想藏起来，等生完孩子，再设法回到无神论的麦迪逊。

我没有怀孕，但我确实恋爱了，而且确信自己要嫁给卡洛斯。那是一九六八年，避孕药才刚刚问世。在生物学期末最后一堂课上，教授大谈各种避孕方法，吸引了一千名学生来听课。因为人太多，大家只好站着，并且都坚持到了最后，谁也不想漏掉教授讲的任何一个字。在男女同校的大学里，对怀孕的恐惧和可怕的堕胎故事是我们日常生活和谈话的主题。说到自己，我其实还停留在毫无经验的青涩级别，至少从技术层面上讲，遇到卡洛斯时我还是一个处女，当我们“完全合拍”时，我找不出人与他作比较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把婚姻视为对性的许可：如果我们要做“那件事”，我们就应该结婚。卡洛斯理论上大致同意我的观点，毕竟他接受的是多明我兄弟会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教育。

不论怎样，他承受住了我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，勉强同意与我共度一生。次年夏天我们在我老家丰迪拉克的圣约瑟夫教堂成婚。我穿着从表姐芭芭拉那里借来的结婚礼服，戴着自己做的面纱，其前身是我从圣何塞街头小店里淘来的一些西班牙花边。我并非想要多么盛大的教堂婚礼，但这对我母亲意义非凡，因此婚礼仪式我们一样都没落下，有正式晚宴，有香槟酒，还有完全按

①哥斯达黎加，西班牙语为：Costa Rica。

我母亲意愿订做的多层蛋糕，安排这些事让她兴奋不已。

我和卡洛斯三年之内生了两个小哥斯达黎加人——詹妮弗和迈克尔，他们都是在圣何塞的天主教医院出生的。我获得了以英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位，在一所新开设的双语学校工作。我们还买了一辆二手的大众面包车，以方便卡洛斯经营小规模旅游业务——把游客从火山景点载到咖啡种植园。

然而，我们并非是那种在为生活打拼的岁月里幸福相伴的小两口，尽管两个人都忙忙碌碌，为小家庭的未来共同操劳。我们几乎见不着彼此。婚后第二年，卡洛斯接了一些客户，为他们提供会计服务，他声称只能在晚上与他们会面。起先每周有两三个客户，他便有两三个晚上不在家，后来发展成四五个客户和四五个不归家的夜晚，最后他几乎每晚都不回家。深夜，我独自一人累倒在床，因为忙于教学工作和照顾两个孩子而筋疲力竭。

每当他走向前门打算出去的时候，我便冲他大喊大叫：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必须是今晚？你要去见什么人？一会儿用西班牙语，一会儿用英语。我把写给他的信放到餐桌上，希望在我睡着时，他能打开看一看；我痛哭着以示抗议，苦苦哀求他与家人多待一会儿。更多时候，我只是在早晨一遍遍地质问他：你去哪儿了？这么长时间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跟谁在一起？

有时卡洛斯试图用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来安抚我，但大部分情况下他就用几个字打发我，比如“现在不想说”或“我们以后再谈”什么的。如果被我的愤怒惹急了，他就面无表情地死死盯着我，直到我屈服。“Me hizo comer hielo.”用西班牙语说，就是“他让我吃冰块。”在愤怒与沉默中度过痛苦的一年后，他的本性

暴露无遗，“我没必要给你解释，”他说，“我是这间房子的主人。你是我老婆，两个孩子的妈。”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嫁给了一个大男子主义老爷们？谁能想到我会成为一个粗老爷们的老婆，做那种忍气吞声低眉顺眼的女人？难道我要任他打骂，忍受他所有的乖戾行为？很明显，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们俩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。结婚以前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少得可怜，根本不知道需要跨越多大的文化鸿沟。

还有更让人出乎意料的：卡洛斯是私生子。他母亲朱莉娅是一名尼加拉瓜巫医，父亲豪尔赫·阿卜杜拉是一位土耳其商人。他们在一个乔木果树种植园同居时，他母亲怀上了他。没多久，他母亲发现他父亲与别的女人有染，于是跑到那女人家大闹，把他父亲从两人睡觉的床上赶下来，用弯刀削掉了那负心汉的耳朵尖。后来，他母亲赶跑了他父亲，那男人再也没在卡洛斯的生活中出现。卡洛斯十一岁时，母亲打发他坐船离开那个位于巴拿马边境的丛林小镇，住到圣何塞的一户人家里，以便他将来能上高中。我曾在朱莉娅的房子里待过，亲眼目睹了他对儿子和孙辈们的冷漠；她自己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本书。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卡洛斯，怎么可能成为我所期待的细心丈夫和居家好男人？

我把返回美国当作挽救我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天真地以为，如果离开了各种“罪恶场合”（天主教所说的“诱惑”），如果能不时接触楷模人物（我家里的男性），那么卡洛斯会有所转变。而且当时我感到很孤独，十分想家。迁居美国对他来说意味着一次重大改变，当然也意味着他有了可以四处吹嘘、令人艳羡的经历。他同意了。一九七二年，我们举家迁往科罗拉多州。

我在卡森堡找到一份教授英语的工作，学生大多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波多黎各大兵。第一次离开中美洲，卡洛斯显得既兴奋又紧张，他同意先待在家里照看孩子，同时慢慢适应美国的生活。不过他很快就厌倦了，于是在外面找了个漆房子的活儿。

那条让我们彼此疏远的裂痕并没有弥合，我们的关系依然紧张，我们一直在自欺欺人。那时，从身体上讲，大多数晚上我们共处一室，然而在精神上，已退回到各自隐蔽的角落里。如果一定要说话，那内容肯定是关于孩子或家务的。控制权一直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——谁拥有这个控制权，又如何行使它。例如，虽然我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，却永远都无法确定自己可支配的数额。我知道卡洛斯做油漆工的价钱，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工，什么时候完工，但他每周给我多少钱完全视他的心情而定，这让我感到愤怒。

为了争夺财务大权，我们俩争吵不休。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让两人之间爆发大战。一个星期天，吃过早饭后，卡洛斯提议打包野餐，把东西塞到车里，出去兜兜风。

“那我们去哪里？”我一边把孩子和野餐篮放在后座上安顿好，一边随口问道，四个人都准备好出发了。

“为什么你一定得知道这个？”卡洛斯握紧方向盘答道。他眼睛直视前方，却没有发动车子。

“我确实不需要‘一定得’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哦，等等，你是想给我们个惊喜吗？”

卡洛斯把脸转向我，“不，”他说道，“没有惊喜。”然后他别过脸发动车子，我们就这样一路沉默地到了目的地，我已经不记